

自然科学离不开阶级斗争

——达尔文进化论学习札记

卢继传

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自然科学与社会阶级斗争的密切关系。

十五世纪下半叶，近代自然科学开始兴起，到了十八世纪，天文、数学、物理、力学逐步从神学统治中解放出来。但十八世纪的欧洲，宗教仍具有很高的统治权力，自然科学还受到神学的束缚，而生物学被禁锢于神学之中。当宗教统治生物学的时候，生物学只不过是圣经的注释，教会恭顺的婢女。神造论、特创论、目的论支配着生物学。它们只是说法不一，实质都是宗教的学说。他们认为，世界上的生物都是按照上帝自己的意志、目的分别创造出来的。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生物创造出来以后，永远不变。那时，不少的生物学家信仰宗教，承认上帝、神是造物主，主张“物种不变论”。瑞典的林耐看到生物多种多样，种类之间有亲缘关系，进行了分类。他却认为，各种生物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它们从未发生变化。法国的居维叶研究了化石，看到了古代生物与现代生物是不同的。但他不认为生物是进化而来的，而是地球发生了激变，从前的生物都遭毁灭，上帝再突然创造新的出来。所以，生物无论如何也是没有变化的。应该说，林耐与居维叶所发现的自然历史事实，是与宗教学说相矛盾的。但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局限性，不敢触犯宗教，相反地宣扬了“物种不变论”，这正是符合于资产阶级要求的。十八世纪，欧洲一些国家，资产阶级已经占据统治地位。它为了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地位，需要这种神学论和形而上学的自然观。

是谁打破了生物学的这种陈腐的自然观呢？这就是达尔文在总结前人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所提出的进化论。达尔文以极其丰富的材料说明，生物是自然界演化发展的结果。它们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在发展过程中，旧种灭亡，新种产生；现代的生物是以前生物的子孙，它们有共同的祖先，世世代代相传。经过了漫长年代，形成现在地球上生物界丰富多彩的景色。达尔文以“生存斗争”和“自然选

择”叙述了生物是怎样进化、发展的。他认为，生物繁殖很快，为了生存，需要争取空间、食物而进行斗争；同时在斗争中发生变异，适应生活环境，生物得到发展，形成物种。不适应于生活环境，便被淘汰，遭到灭亡。简单地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就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生物有自己产生、发展的历史。从此，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生物看成毫无联系的、神造的、不变的神造论、特创论和目的论，从根本上结束了宗教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统治生物学的时代，使生物学发生了一场革命。

达尔文进化论轰动了整个欧洲，影响很大。

马克思、恩格斯是最了解达尔文进化论的意义的人。李卜克内西在《忆马克思》一文中，做了这样描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发表后，马克思就估价到它的巨大作用。“达尔文远离大城市的烦嚣，在他宁静的庄园里准备着一个革命，马克思自己在世界喧嚣的中心所准备的也正是这种革命，差别只在于杠杆是应用于另一点而已。”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后，马克思、恩格斯立即抓住了达尔文进化论的革命内容，给予高度评价。这本书说明生物界是如何进化的，又是如何互相联系和转化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法提供了活生生的科学根据。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这本书说明了生物界是如何通过斗争不断进化、发展的。这就从自然科学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斗争的哲学和发展的哲学。马克思指出：“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

然而，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反动统治阶级看到达尔文进化论的革命内容，十分恐惧。他们宣布达尔文是反基督教者，是个“罪犯”。英国反动势力召开一系列所谓辩论会，激烈地攻击和讥笑达尔文。德国反动势力嘲骂达尔文的著作是

“疯书”；铸造了一枚纪念章，纪念章上达尔文被丑化成笨拙可笑的人物。杜林怒不可遏，攻击达尔文进化论是“粗野的哲学”。达尔文和他的支持者赫胥黎、海克尔等人，给予有力的回击，并取得胜利，达尔文进化论很快传播到世界各国，深入人心。

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所产生的激烈斗争，非常突出地说明了这场斗争的现实的社会意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认为，达尔文进化论好得很，做了充分肯定，同时又指出其局限性；各种反动势力却认为，糟得很，怕得要死，横加攻击，妄图阻挠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很清楚，两种不同的态度，代表了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立场，反映了达尔文时代的社会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当时，资产阶级为了巩固反动政权，对革命、进化害怕起来，并使用政权镇压革命。列宁曾这样说过：“如果数学上的定理一旦触犯了人们的利益（更确切些说，触犯了阶级斗争中的阶级利益），这些定理也会遭到强烈的反对。”达尔文进化论正是触犯了资产阶级和宗教势力的利益，而遭到了激烈的反抗。事实证明，在阶级社会里，自然科学理论便成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

二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达尔文也不可能存在于阶级斗争之外，他理论上的错误，就是阶级斗争在他的科学研究中的一种反映。

马尔萨斯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他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加。它们之间的矛盾不可能解决，因而社会人口过剩，贫困和灾难也就不可避免了。他曾这样自白：穷人来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找不到空着的餐具，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滚蛋。因此，劳动人民只能听天由命，心甘情愿地受压迫、剥削，不去进行反抗和革命斗争。“人口论”是对劳动人民穷困的一种辩护，从而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永恒的。它完全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革命的反动理论。

达尔文最大的错误方面，是搬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来解释生存斗争。达尔文认为，一切生物都是照几何级数繁殖，以致无地可容，它们为了生存，互相进行斗争；斗争的结果，强者生存，弱者灭亡。他说：“这是马尔萨斯的学说应用到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于是，达尔文把生物之间的关系描绘成残酷的复杂的战争。他说：“我们可以自慰，就是完全相信自然界的战争并不是没有间断的，恐惧是感觉不到的，死亡的来临通常是迅速的，而强壮的、健全的和幸运的总会生存，还能够繁殖。”这样，达尔文把生物界看成资本主义人吃的社会一样了。

其实，达尔文进化论并没有给马尔萨斯人口论有什么论证。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论据之一，就是人类的食物、生活资料是按算术级数增长。达尔文却证明，动、植物是和人一样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恰好，达尔文

是从自然史方面，否认马尔萨斯反动理论。

达尔文的错误有他的认识根源，即只看到生物界的对立，而没有看到统一。由于他的思想方法片面性，夸大了生存斗争的作用，做出错误的论述。而更重要的是他的阶级根源。

在阶级社会里，各种人、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烙印。自然科学不可能离开阶级斗争而孤立存在。自然科学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就这一点而言，它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当人们去解释和总结自然现象、自然规律，成为自然科学理论的时候，总是浸透着人的阶级立场、阶级意识的。达尔文出身于英国资产阶级的家族，他曾进入神学院深造，读了一些圣经等神学书籍，取得了学位。这些在达尔文身上深深地打上资产阶级烙印。达尔文搬用马尔萨斯“人口论”，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的保守性。

十八世纪末叶，英国反动统治阶级对于法国发生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情况，极为震惊，需要制造反革命舆论来维护反动统治地位。这时，马尔萨斯提出了一套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理论。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一个反对法国革命和英国改革论者（葛德文之流）的小册子。”因此，“人口论”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反动思潮，是适应于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是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但是，革命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到了十九世纪，欧洲到处爆发革命。英国的工人、农民起来革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出现于政治舞台上，威胁着反动统治阶级。对于生活于这一时代的资产阶级科学家达尔文来说，在这革命浪潮中，不可能不受影响，但他没有背叛本阶级的利益。因此，当他在调查生物中，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后，一下子被蒙住眼睛，完全接受。而当马克思把宣传阶级斗争理论的“资本论”赠送给达尔文时，他害怕自己的名字与伟大革命家的名字联系起来，拒绝了这件礼物。这正是反映了达尔文的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意识。

事实证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个科学家的立场、思想意识与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所属的时代以及社会上各种思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三

由于达尔文的错误，给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有机可乘。恩格斯指出：“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它的无条件正确，特别是涉及马尔萨斯学说的东西，还很成问题），要把这些理论从自然界的历史再搬到社会的历史，那是很容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把生物界规律搬到社会领域，就是变了这个很容易的戏法。

达尔文提出了人起源于猿的理论，给“上帝创造了

人”的宗教观念以致命的打击,这是当时很宝贵的科学成就。但他不懂得劳动在从猿变为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因而也不了解人的社会性。结果,他否认了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这个科学上的失足,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歪曲、利用。他们用生存斗争、自然选择来解释社会阶级斗争。在他们看来,社会等同于生物界。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就是生存斗争,是一群人反对另一群人,互相残杀。人生就是不断地自由竞争,斗争的结果,强者消灭弱者。人类社会之中好比古代罗马格斗斗。在格斗中,最强健敏捷者最狡猾者得到生存,最弱者最蠢者死亡。因此,人要生存,就要征服和消灭竞争的敌人。而统治阶级、压迫者、侵略者是“最适于生存者”,被统治阶级、被压迫者、被侵略者是“不适于生存者”。所以,社会上的弱肉强食的不合理现象,也是一种自然规律,不能改变的。显然,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用科学打扮起来的,宣扬一种剥削有理、压迫有理、侵略有理的反动理论,是一股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目的是证明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好的社会。恩格斯指出:“而断定这样一来便证明这些论断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那就过于天真了。”

人与动物有着根本的区别。人总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在于社会性。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历史前进。阶级斗争与生物界的生存斗争反映着两种不同的规律。恩格斯指出,如果硬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有所谓“生存斗争”的话,那就是无产阶级从资本家统治阶级手中夺取政权的阶级斗争。他这样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谓生存斗争就采取了如下的形式:必须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生产力,使它们不受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毁灭性的破坏作用的影响,办法是从不能办到这一点的资本家统治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还有,达尔文否定了居维叶的“激变论”的时候,却极力宣扬了“自然界没有飞跃”的错误观点。于是,有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如获至宝,把生物“进化”引入社会领域,加以歪曲,说什么生物的进化、发展不是质变,只是量变。于是,他们否认事物的飞跃,只承认“进化”,否认革命。这就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出现的庸俗进化论。它成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按照这种谬论,提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这又是一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思潮。

* * *

总起来说,达尔文进化论是在反对宗教势力和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激烈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反对不变观念,主张进化,是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具有革命的要求,对生物进化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衰亡时期,特别发

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走向反动,便要反对革命。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时而攻击达尔文进化论,时而歪曲它的革命内容和利用达尔文的错误,制造各种反动理论,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而围绕达尔文进化论的斗争,所产生的反动思潮,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危机、政治危机的反映。列宁在批判物理学的唯心主义时指出:“只要回忆一下欧洲各国经常出现的占绝大多数的时髦哲学流派,从那些和锤的发现有关的哲学流派起,到那些正在竭力抓住爱因斯坦学说的哲学流派止,就可以知道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阶级立场及其对各种宗教的扶持同各种时髦的哲学流派的思想内容之间的联系了。”同样,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反动思潮的出现是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立场相互联系在一起。反动的统治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和利用自然科学理论,来为反动政治服务的。

在阶级社会里,自然科学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从来就是尖锐、复杂的,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便去占领。我们可以从达尔文进化论的发展的一段历史认识到,在科技战线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经常地通过自然科学领域来影响我们。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和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鼓吹者,妄图利用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取消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科技路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必须彻底批判。我们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回击右倾翻案风,坚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渗透在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反动思潮,使科学研究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线胜利发展。

(上接第 44 页)

是双倍体,其染色体数目经定位计算结果与西欧、日本的银鲫一致,染色体数为 94。单性银鲫卵核的双倍染色体组合究竟怎样实现?现在尚无确切的结论。有人推测在第一次卵裂之前,通过卵核的单倍染色体的数目加倍恢复为双倍体。有人设想,最大可能是单性银鲫减数分裂被严重破坏,成熟卵的染色体是三倍体。

天然雌核发育具有重要的适应意义,在单个或单一雌体存在的条件下,群体可得到恢复和发展。

近年来有人用人工雌核发育的方法在家鲤、泥鳅等鱼类上成功地获得了后代。这种方法是用一定剂量的射线照射精子,使精子失去遗传活性,鱼卵完全在雌核控制下发育。放射雌核发育第一次减数分裂正常,雌核双倍化是与第二次分裂的破坏相联系的。

放射雌核发育的研究成果,对遗传育种工作有重要的作用。